

K 3019.13  
JING KANG ZHAN SHI YAN JIU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 抗战史研究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



K26  
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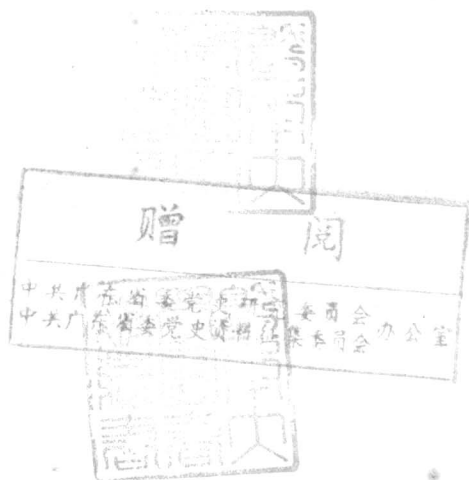
K 301913



广东

# 抗战史研究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同太平洋各国隔海相连，在中国抗战和太平洋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八年中，广东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为取得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东抗战史是全国抗战史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这个课题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无疑是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近几年来，我省史学工作者在各单位、各院校及研究机关的组织、领导和支持下，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和实事求是、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对广东抗战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本会在广州联合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各地会员提交的论文，共达一百零九篇。这些论文研究的范围比较广，但大多数是分析、研究广东抗战的历史问题

的。其中有的研究了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问题；有的发掘整理了罕为人见的历史文献资料，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有的则借鉴抗战时期的历史经验，联系实际，发表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总的看来，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特别是在如下几个问题上，还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一，关于广东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在广东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前后，广东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曾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广州、香港向来是各界重要人士云集之地，易于沟通、连结各方，因而广东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不少同志都注意到这两个特点，致力于收集、整理有关的资料，深入探讨有关的问题，对“广东青抗先”、“救亡呼声社”、“汕头青抗会”等团体的活动，作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对中共广东党组织及宋庆龄、何香凝等在广州、香港各地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统战工作，也作了比较扎实的研究。

第二，关于华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纵队的史实和特点。华南敌后抗日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敌后战场之一；党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是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出现的又一支伟大的抗日人民军队。但以往对这个专题研究不够，不仅缺少专门的论著，而且资料的收集整理也很不完备。这种情况近年来有较大的改变，广东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的历史文献资料已陆续编印；东纵、琼纵、珠纵、南路和韩江等抗日人民武装的史稿已着手编写，其中《东江纵队史》已正式出版。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中，不少同志又专门分析探讨了广东各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建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影响，提出了许多较有价值的资料和值得重视

的见解。这都表明，对于广东抗战历史的研究较之过去有了新的进步。

第三，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的组织状况及其主要活动。要研究广东抗战的历史，自然要着力研究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的名称迭经更改，组织机构不断变动，党的活动经常处于秘密状态，要认真弄清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近年来，党史研究部门为此作出很大的努力，有的同志也向学术讨论会提供了有关的资料和论文。这对于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第四，关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在抗战中的活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是大力援助和积极参加祖国抗战的，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少史学工作者都注意研究这个课题，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捐助抗战，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抗战中的活动，华侨和港澳同胞著名人士的抗战事迹，华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问题，分别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这也弥补了过去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并且为做好新时期的爱国统战工作，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关心支持祖国四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第五，关于广东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抗日活动。广东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抗战八年中，大多数官兵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抗日活动应当予以肯定，应在抗战史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述。在学术讨论会中，不少同志都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并就国民党军队的南澳抗战和粤北会战等战役，专门写了介绍和评论的文章。

由上可以看出，史学工作者对广东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

多方面的可喜的成果。这本文集主要收录了关于广东抗战史的研究文章，也收录了少数几篇其他内容的文章，目的是想将史学工作者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给各位读者，以帮助广大读者从各个方面了解广东抗战的历史情况；同时，也帮助有关同志了解掌握关于广东抗战史研究进展的情况。

本文集在编辑工作和其他方面如有缺点、错误或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

一九八六年七月

## 目 录



前言..... (1)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黄振位 (1)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

.....关 卫 李忍子 蓝琼兴 (16)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广东的抗日战争.....陆永棣 (27)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回顾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展望.....邓家倍 (87)

东江纵队与反法西斯战争.....曾 生 (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的建立、发展及

其历史贡献.....曾庆榴 陈弘君 罗慰年 (55)

华南抗日纵队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冯鉴川 (70)

华南敌后抗战的几个特点

.....梁 山 王付昌 钟海谟 (83)

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钟钦正 (98)

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

.....陈弘君 李慰祖 罗慰年 (109)

琼崖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 .....吴基林 (123)

试论琼崖抗日根据地的特点 .....韦经照 (185)

琼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 .....胡提春 (144)

琼崖纵队在抗战中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黎 新 郭建华 符和书 (157)

## 抗战时期琼崖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 ..... 邢益森 许志民 (166)
- 香港沦陷后, 抢救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  
国际友人的斗争 ..... 朱生灿 谭力沛 杨锦照 (182)
- 试论粤北第一次会战 ..... 沙东迅 (191)
- 南澳抗战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 陈 阳 林俊聪 (202)
- 潮梅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 刘 寒 洪 流 (212)
- 抗战初期广州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 黄穗生 (222)
- 广东妇女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 侯霭云 (234)
- 救亡呼声社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 黄建新 (246)
- 华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 黄慰慈 许肖生 (259)
-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广东抗战中的作用  
..... 叶洪添 陈登贵 (278)
- 华侨捐输, 支援抗战 ..... 伍国基 (286)
- 香港海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 江敏锐 (298)
- 香港青年学生对广东抗战的贡献 ..... 曾建昭 胡裕农 (310)
- 抗日战争洪流中的何香凝 ..... 蒙光励 (320)
-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广东的斗争 ..... 吴淑珍 (333)
- 浅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 ..... 杨建成 (347)
-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 秦兴洪 (359)

## 附录: 广东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 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 ..... (376)
- 后记 ..... (380)

#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黄振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场反侵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外御其侮的壮举，是炎黄子孙强大凝聚力的又一次生动体现，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本文的任务，就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过程及其特点，略作探讨。

## 一、国共合作的原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这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这次合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第一次国共合作，胜利地进行了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可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当权者违抗历史发展潮流，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次大的曲折。此后，国共两党产生了十年冤

怨，形成“同室操戈”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为何又能重新携手进行第二次合作呢？这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加以考察。

首先，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这是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原因。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日本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国内出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为了摆脱政治、经济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便迫不及待地走上了对外武装侵略扩张的道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沈阳，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步降为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逼进，发生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更为激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国共两党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无非存在两种抉择：或是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或是全国奋起救亡图存。前者曾为少数民族败类所赞赏，后者却为全国民众所主张。然而，要抗日救国，决非一党一派本身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而必须全国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团体同心携手，动员各界民众及其一切抗日力量方能实现。中华民族是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他们都深深感到，救国家之亡，图民族之存，确是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时局愈艰、国难愈重的形势下，国共两党终于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重新走向合作。

其次，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这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民众

运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影响下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救亡活动；国民党内部的一批爱国之士所进行的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日本共产党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领导反帝运动，建立各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sup>①</sup>。尔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维埃政府又先后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在中共的号召和领导下，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多名码头工人首先爆发了反日大罢工。接着，上海各界民众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组织救国会，成立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随后，南京、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民众纷纷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各地的青年学生也络绎不绝地涌向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爆发的抗日救国运动（即“一二九”运动），波及全国。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股反帝的怒涛，给国民党内部以巨大的震动，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民主人士也奔走呼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原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制定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同共产党合作，团结对

---

① 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

外。翌年，又发出“组织反日阵线”宣言，“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主张“集中全国一切力量，发动反日战争”<sup>①</sup>。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致公党（原称“洪门致公堂”）也号召党员共赴国难，并发动华侨募捐，支持祖国抗战。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银行公会等团体也发出通电，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还有各地建立的抗日救国会，都一致主张停止内战，团结御敌。此外，沈钧儒等“七君子”和陶行知、黄炎培等知名人士也挺身救国，力主团结，推动国共合作。

面对外敌入侵，一批国民党将领和有识之士，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毅然走向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行列。“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致电南京政府，力主抗战。后来，他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欣然同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当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等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这期间，宋庆龄从德国回国，便投身救亡运动。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sup>②</sup>这些国民党有识之士的言论和行动，有力地促使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再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促成。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在亚洲形成了一块战争策源地。德国和意大利实行法西斯

---

① 见《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组织反日战线”提议宣言》（1936,2），《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

② 《宋庆龄选集》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专政，蓄谋对外扩张，在欧洲形成了另一块战争策源地。在世界战云密布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并赞同在中国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西班牙、法国、美国、埃塞俄比亚、巴西、朝鲜、越南等世界各国都先后建立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各种反战组织，汇成了一股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这股洪流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最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害冲突，迫使国民党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内外政策，这也为国共合作提供了一定条件。最初，美、英、法帝国主义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它们妄图把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象它们预想的那样美妙。日本对华的侵略，使英美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打击。英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逐步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这对国民党内部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以四大家族为主的亲英美派与英美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斗争锋芒主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国民党就有可能和共产党实行合作。而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也“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sup>①</sup>

总之，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促成的，是我国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598页。

## 二、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周恩来曾回顾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sup>①</sup>从“九一八”至国共合作形成，历时六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第二阶段，从西安事变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阶段，“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sup>②</sup>国共双方斗争的锋芒，尚未完全集中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国共合作还处在酝酿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民众的民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的宣言。但是，这个宣言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郑重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

---

<sup>①②</sup>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1页。

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sup>①</sup>这个宣言，突出了民族矛盾，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虽然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内战政策，但没有再提打倒国民党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表明了我党愿意和国民党合作的愿望，标志着我党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变。特别是我党在瓦窑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更以实际行动出师东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我党便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继而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党发表的一系列宣言、通电和“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充分表明了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促使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上层领导的亲英美派（蒋介石）和亲日派（汪精卫）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某些局部地区已开始了和共产党合作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冯玉祥、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将领同共产党签订了合作抗日协定。一九三六年春，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和我党初步达成了互不侵犯、互守原防、恢复交通、经济通商等协议。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六月间，国民党内部

---

① 见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在对日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纷争。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出兵湖南，和南京蒋介石政府采取对立态度。面对上述这种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日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蒋介石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说，政府虽然努力保持和平，“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的条约。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sup>①</sup>。同年七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表示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九月，南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塘沽协定”，拒绝了日本政府的各种无理要求。这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有了新的转变。

这期间，国共两党长期形成的嫌隙，也渐趋消释，开始了面对面的重新接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向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提出，让他同中共代表就抗日问题进行协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等会见了邓文仪，就国共合作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的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通过谌小岑（国方）、吕振羽（共方）等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接着，中共即派周小舟到南京进行非正式的谈判<sup>②</sup>。一九三六年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

---

① 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7页，1981年9月初版。

② 参阅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径。”<sup>①</sup>九月一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sup>②</sup>接着，中共代表潘汉年前往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虽然经过了复杂的斗争，但却打破了国共双方长期对峙的僵局，使国共关系逐步趋向好转，为后来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和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显然，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愿意就对日问题和共产党进行磋商，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放弃内战政策。因此，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采取了断然措施，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这使国共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

第二阶段，国共合作从酝酿进入形成阶段。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当即派遣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谈判。经过周恩来等的艰苦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大大加快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sup>③</sup>

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和联合抗战，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

<sup>①②</sup> 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6月版。

<sup>③</sup>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352页。